

现代文学散论

秦川 著



XIANDAI WENXUE SANLUN

重 庆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杨希之
封面设计： 徐赞兴

秦 川 著
现 代 文 学 散 论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5 插页3 字数221千
1988年2月第一版 1988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500

*
ISBN 7-5366-405-X/I·73

定价：2.55元



作者秦川和王瑶先生合影

序

吴 奔 星

1917年的“文学革命”快七十年了。七十年来，我国新文学运动，除了十年浩劫和受极左思潮干扰的某些年代外，总的说来，是有成绩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不仅拥有一支人才辈出的作家队伍，也涌现了一支具有马列主义思想水平的文学史家和文艺理论家队伍，他们显示了人民文学事业的兴旺、发达。

我搞了五十年的文学创作和文学史研究工作，虽无多少成绩可言，但在漫长的岁月中，我阅读了一些较好的纵向叙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纵向论述的现代文学评论的专著，使我经常意识到“文学革命”以来创作方面的许多光辉成果和理论研究方面的不少卓越贡献，内心感到由衷的喜悦。现在，又有一部以横向评论为主而又适当结合纵向叙述的《现代文学散论》(下文简称《散论》)摆在我的案头，不禁涌起一种兴奋的心情。这是中年文艺评论家秦川的新著，书名“散论”，实际内容集中，重点突出。秦川同志长期从事文艺编辑、出版工作，见多识广，发而为文，就力避陈腔旧调，而显示其格调新颖、颇多创见的优越性。

《散论》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两篇文章，都是关于

鲁迅研究的。其中值得特别推荐的是《鲁迅对中国革命出版事业的伟大贡献》一文，它内容充实而又富有功力。过去虽有回忆鲁迅与出版事业的文章，但大都零散，未作全面系统的考察，此文对鲁迅一生的编辑、出版活动，从方针、道路、特色、经验以及贡献等方面，进行了细致、深入、全面、系统的概括，充分肯定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并且卓有说服力地论证了鲁迅还是一个卓越的编辑家和出版家的历史地位，填补了几十年来鲁迅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至于《学习鲁迅论文艺的真实性札记》一文，阐述了鲁迅强调文艺的真实性，清除“瞒和骗”的文艺的观点，似是老生常谈，但发扬鲁迅求真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克服长期以来在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非现实主义倾向，仍然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第二部分六篇文章，都是关于郭沫若研究的。四川是郭沫若的故乡。近几年来四川中老年学者对郭沫若的研究，非常活跃，取得了不少成果。《散论》所收六篇，都是作者到了新的学术研究岗位后写成的。这六篇文章对郭沫若早期与中期（主要是在抗战时期）的文艺思想、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作了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论述。后三篇是对郭沫若抗战时杂文、历史剧与文化活动的研究。作者对一些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至于前三篇，如郭沫若与民间文学和外国文学以及郭沫若对“五四”新文学建设的几点意见，是作者站在当前时代的高度，以开放的眼光，从总结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入手,以历史的比较的方法,多方面、多角度地探讨了郭沫若的文学活动的历程、创作实践的规律以及他的成功与成就的秘诀,对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是具有借鉴和启发的现实意义的。如郭沫若与民间文学的关系,过去很少人探讨,作者写此长文,探索了民间文学对《女神》中某些新诗、诗剧和其它历史剧的产生以及开一代诗风的艺术个性的形成的深远影响,显示出郭沫若的文学活动与文学创作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在深厚的民间文学、古典文学的传统上,有选择地借鉴西方文学的历史过程。这对当前某些中青年作者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出现的“自我迷失”和思想混乱,将起一些清醒的作用。

与此相联系的是另一篇论述郭沫若早期小说与外国文学的文章,探索出郭沫若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以小说创作开始其文学生涯的。同鲁迅一样,郭沫若对待外国文学是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的。

至于《郭沫若早期关于新文学建设的几点意见》一文,是一篇发人之所未发的文章。此文的材料与观点都很新颖,对了解郭沫若早期的文艺思想,至关重要。破坏与建设,或者说破旧与立新,是“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基本倾向。对于如何建设新文学,郭沫若曾有自己的构想,但是,他的构想,未能及时发掘,长期以来,湮没不彰。他在1920年1月18日给宗白华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出,要对孔子另作评价。他认为“孔子底存在,是断难推倒的。他删《诗》《书》,笔削《春秋》,使我国古代底文化有个系统的存在。”在很多地方,郭沫

若反复强调，不能忽视对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他认为整理文化遗产，发掘民族传统精神，是与“五四”时代的求新创造精神相通的，是有助于中国新文学的建设的。在同一封信中，他还指出，建设新文学，应“先以国民情调为基点”，“只图介绍些外人言论，或发表些小己底玄思，终竟是凿枘不相容的。”这对开放与改革时期的新文学，也还没有失去它的积极意义。他还主张编纂新国风，从人民生活 and 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这使人联想起他在六十年代初期与周扬同志合编的《红旗歌谣》，表明他关于民间文学会促进新文学建设的观点，是贯串他的一生的。与此同时，他也强调引入外国文学思潮，目的不是为了否定传统，而是“借石他山用以攻错”。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当时就已指出，要建设新文学，作家、艺术家首先要进行自我建设，使自己的人格完美高尚，从而去改造人，改造社会。在没有极左思潮影响的当时，郭沫若提出的改造作家、改造人的观点，是与鲁迅一贯主张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相一致的，很值得今天的文艺界的重视。

第三部分六篇文章，是关于抗战文学以及曹禺、沙汀、艾芜等作家作品的研究的。曹禺虽非四川人，却曾在战时陪都重庆生活过、工作过。因此，这组文章颇有“川味”。关于抗战文学的研究至今还是一个薄弱环节，究竟如何界定抗战文学，如何分期以及如何估价，历来众说纷纭。作者除了提出自己的看法外，特别辨证了抗战文学“右倾”、“倒退”等观点，力图给抗战文学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关于曹禺的《原野》，作者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新

旧版本的比较，从曹禺的修改中，提炼创作剧本与锤炼语言的经验。另一篇是重评，这是较早为《原野》翻案的文章。作者认为《原野》是曹禺继《雷雨》和《日出》之后的第三部代表作，较之前者视野更加扩大，技艺更加精进，是曹禺在创作道路上对艺术追求的新的里程碑。针对过去对它的“左”的或教条式的批评，作者从题材、主题、人物等方面作了切合实际的分析，充分肯定了《原野》的现实主义精神与艺术上的成就。

第四部分三篇文章，是针对海内外某些作者对鲁迅与郭沫若的贬损与否定的现象，或者予以还击，或者开展争鸣，都表现了作者自己的独特看法。

综观以上的简略介绍，可知《散论》作者是力图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他对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以及文艺运动，总是实事求是地进行考察，既有具体的分析，也有确切的评价，以事实说话，无所夸饰。在方法论上，既突破“左”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观点与方法，也以开放的精神，引进新的观点和方法，挖掘新资料，提出新见解，填补了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空白，把关于现代文学的研究与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创作联系起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我有幸作为《散论》的第一批读者，特表达一点先读为快的喜悦之情，愿与广大读者共享之。

1986年11月16日于南京师大

目 录

序.....吴奔星（1）

鲁迅对中国革命出版事业的伟大贡献.....（1）

真诚深入大胆地看取人生

——学习鲁迅论文艺的真实性札记.....（36）

试论郭沫若与民间文学的关系.....（45）

郭沫若早期小说与外国文学.....（68）

郭沫若早期关于新文学建设的几点意见.....（81）

也谈《孔雀胆》.....（101）

略论郭沫若抗战杂文的艺术特色.....（112）

郭沫若战斗在文工会.....（133）

重评《原野》.....（173）

谈曹禺对《原野》的修改.....（194）

重读沙汀的《敌后琐记》.....（212）

艾芜和他的《江上行》.....（221）

论何其芳的艺术个性.....（237）

中国抗战文学的界定、分期和评价问题.....（255）

关于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和评价问题

——评夏志清等人对鲁迅小说的评论…………… (277)

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

——驳史剑《郭沫若批判》的谬论…………… (299)

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对郭沫若的评论…………… (318)

建国三十五年来郭沫若研究述评…………… (339)

后记…………… (353)

鲁迅对中国革命出版事业的伟大贡献

在鲁迅战斗的一生中，革命的编辑、出版工作，不仅与他整个的光辉业绩紧密相连，而且成为他的全部生活甚至生命中不可少缺的支撑力量。在鲁迅对中国革命、对新文化运动和对新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巨大贡献中，正包含着他对中国革命出版事业所作的伟大的贡献。作为一个出色的编辑工作者和伟大的出版家，鲁迅在革命的编辑、出版工作中，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至今仍享用不尽，还有指导的作用。他那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不屈不挠和韧性战斗的革命精神，和他那为革命哺育新花，忘我牺牲，甘为他人作嫁衣的崇高品德，更是值得永远敬佩和永远学习的光辉榜样。

鲁迅对中国革命的编辑、出版工作的伟大贡献和宝贵经验，解放前和解放后都曾有过一些回忆录和单篇文章谈到过，但由于种种原因，大都较零散，不够系统和完整，且缺少应有的评价，以致作为伟大的编辑家和出版家的鲁迅并不为大众所熟知。我尝试从下面三个部分作一概括的介绍。

为了评价鲁迅在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的地位和伟大贡献，回顾一下他在中国革命的编辑出版工作中所走过的道路、所遵循的出版方针是非常必要的。按照鲁迅思想发展的分期，即早期、前期和后期等阶段，这里粗略地对他的出版工作加以阐述。

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青年时期的鲁迅，在进化论世界观指导下开始致力于思想启蒙活动的时候，就和革命的编辑、出版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了。

1906年夏天，鲁迅在日本仙台放弃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学习，认为救中国的道路“还应该有一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作为提倡新文艺的第一步，就是着手编辑和出版文艺刊物——《新生》。当时，鲁迅是要以它为阵地，翻译介绍外国进步文学，“以起其国人之新生”，即启迪理智，廓清蒙昧，振兴中华民族，改造国民之精神。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的追叙，也说明了他创办《新生》是出于那时发展着的革命形势的需要，是要在古老落后闭关自守的旧中国兴起符合世界潮流的新文学运动的需要。他说：“在东京的留学生……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并未办成。原因是由于出世之前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然而，《新生》的编辑、出版方针和鲁迅办《新生》的革命精神，却一直贯彻到他整个一生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中，并且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鲁迅世界观的变化，不断地得到新的补充和发展，并发扬光大。

1909年，3月2日和7月27日，鲁迅与周作人合作编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两册。这是鲁迅在中国革命的编辑、出版工作中留下的第一个实绩。这两册书共收翻译小说十六篇。计有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四人七篇，波兰一人三篇，波思尼亚一人二篇，芬兰一人一篇。其中鲁迅翻译的有俄国安特莱夫的《漫》、《默》和迦尔洵的《四日》，还翻译了《铎台守》的诗部分。鲁迅为小说集写了《序言》、《略例》和《杂拾》两则，并对全部译稿进行过修改，亲自誊清。这两册小说集中部分作品，就是《新生》的译稿。鲁迅在《序言》中阐明了翻译出版这两册小说集的经过、目的要求和具体的出版办法，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从事编辑和出版工作的根本目的和革命方针。《序言》说：“《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然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沚与，而性解思维，实寓于此。”

1920年，在上海群益书社重印《域外小说集》时，以周

作人的名义写的《〈域外小说集〉序》说：

“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几乎全无……”

“当初的计画，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X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介绍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

这一段话说得很清楚，无论是搞翻译，搞编辑和出版，鲁迅都不是从个人名利出发，或以赚钱营利为目的的。后来，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对革命的编辑和出版方针阐述得很明确。他说：“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绍，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去作翻译和编辑、出版工作，像一条红线贯彻始终。从现在出版的十卷译文集，三百一十多万字的作品来看，几乎都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翻译和编辑、出版的。“从别国里窃得火来”以唤起人民大众的觉醒，激发起人民大众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也贯彻在其他方面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中。

鲁迅一生参与或主编的报纸、刊物和丛书，据统计有三十多种，无一不与上述方针和革命精神相一致。比如辛亥革

命时期，1912年在绍兴由越社主办的《越铎》日报，鲁迅就参加了筹备工作，并担任名誉总编辑。《越铎》日报的发刊辞就是鲁迅的手笔。在《〈越铎〉出世辞》中，鲁迅为报纸阐明的主张是：“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这一民主革命的政治主张与办报方针，不仅同早年创办《新生》的精神基本一致，而且有所发展。

在五四运动前后，鲁迅参加了改组后的《新青年》的编辑部的工作，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和中坚分子。他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站在一起，坚决支持李大钊、陈独秀等把《新青年》办成宣传马克思主义，鼓动革命，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战斗堡垒。他无条件地遵从“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写小说，发议论，主动予以配合。自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五号起，至1921年8月1日出版的第九卷四号止，在三年多的时间内，鲁迅发表了小说五篇，新诗六首，随感录二十二则，思想批判论文二篇，通信三则，翻译文学作品四篇，附记、正误等其它文字七则，共四十九篇。著名小说《狂人日记》就发表在1918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五号上。五四运动爆发，李大钊把当月主编的《新青年》办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鲁迅在这期专号上，一下子就发表了小说《药》，随感录《来了》、《现在的屠杀者》、《人心很古》、《圣武》等五篇很有革命性和战斗性的作品。鲁迅与李大钊并肩战斗，反帝反封建，猛烈抨击旧礼教、旧道德，深刻总结了辛亥革命的经验 and 失败的教训，热情赞

扬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战斗作用，影响深远。那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三十三篇随感录，即是鲁迅在战斗中创造的最主要的文学新形式——杂文。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发生了分化，1922年7月，《新青年》停刊了，团体也随之解散。正如鲁迅后来回顾的那样，五四时的战友，“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虽有短暂的彷徨，但却未停止过对中国革命的探求，未停止过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继续同军阀官僚统治及封建伦理道德进行战斗。

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明确指出了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之必要。他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在《华盖集·题记》中，鲁迅也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憚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

注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即思想批评，这是在五四运动之后，随着时代的前进和鲁迅思想的发展，在编辑出版工作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新的内容和新的特色。

1924年11月，鲁迅发起组织了“语丝社”，编辑出版《语丝》周刊，1925年4月，又同韦素园等组成“莽原社”，编辑

出版《莽原》周刊（后又改出半月刊），均由鲁迅主编。稍后，在1925年8、9月间，鲁迅还与一批有志于外国文学翻译的青年组成“未名社”，出版《乌合丛书》和《未名丛刊》。必须着重指出，《语丝》和《莽原》在当时是两个注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进步文艺刊物。诚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它们在同封建军阀统治及其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代理人——“甲寅派”和“现代评论派”等斗争时，起到了重要阵地的作用。鲁迅在那时的许多重要作品和著名杂文，都发表在这些刊物上。

仅以鲁迅在北京时期为例，从1924年的11月17日《语丝》创刊起，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鲁迅发表在《语丝》上的作品就有六十余篇，几乎占他在《语丝》（1930年3月第五卷第五十二期终刊）上发表作品总数一百四十余篇的一半。这对刊物的政治倾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鲁迅主编的《莽原》，从1925年4月24日创刊起，到1926年8月他离开北京去厦门，把刊物交与韦素园接编止，他在刊物上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其中就有《春末闲谈》、《灯下漫笔》、《我的“籍”和“系”》、《答KS君》、《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著名杂文，有很强的战斗性，集中代表了《莽原》的战斗特色。

在鲁迅看来，开展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最理想的形式，就是杂文。正如鲁迅自己所阐述的那样，杂文“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事物，则竭力加以排击。”短小、精悍，十分灵活；在斗争中有如匕首，投枪，易制强敌于死命。所以，鲁迅大力提倡，自己也大力写作。之所以如此，并在其主编的刊物上显示这样的倾向和特